

“高效课堂”的价值迷失

——对“高效”与“无效”的思考

王红霞



其实第一次提出“语文教学效率问题”的是吕叔湘先生，他在1978年3月16日的《人民日报》撰文说：“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十年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言，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是不是应该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吕先生的这篇文章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场全国性的语文教学改革拉开了序幕。到了21世纪，新课改一声炮响，于是各地的语文教学改革的捷报频传，但无论是哪个地区，哪个学校的改革成功，最终都是用“分数”说话的，似乎只有“高分”才能说明其“高效”。

我一直在想，吕先生所说的“效率”指的是什么呢？“成绩”又指什么？当时吕先生提出这一问题的背景是政治运动对语文教学的破坏，所以这个“成绩”不单指分数。可是当下的现实状况却是，有太多的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甚至是教师也将“高效”与“高分”划了等号。语文“分数”是一个最微妙、最微妙的东西。卷面上呈现出来的分数，未必是一个学生真实的语文水平——即使能反映这个学生的语文水平，也无法全面而准确地反映语文这门人文学科在学生生命意识里的价值和意义。

选修课本《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里有一首

名诗《将进酒》，在学生能通读和翻译的基础上，我抓住了课下注释里的一句话：“这首诗大约作于天宝十一年，距诗人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已达八年之久。”我就让学生回忆前不久刚学过的李白被赐金放还时的那首《梦游天姥吟留别》里印象最深刻的句子“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同时再让学生回忆李白离开家乡时的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信，再联想到李白最初“愿做辅弼之臣”的政治理想，让学生在课文里找一下，看曾经自信的李白在经历了“赐金放还”的打击八年之后，有没有什么变化？

学生通过阅读和讨论找到了两组句子：“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和“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找第一组句子的学生认为，李白没有变，他还是那么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找第二组句子的学生则认为，李白变了。八年前，他是那么赤裸裸地大声宣布“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表示他不与权贵合作的态度，但八年后，虽然也在表达自己的愤懑，不过他却成熟多了，含蓄多了，深刻多了。他终于醒悟自古以来贤德的人往往会被统治阶级所冷落而不被重用的社会潜规则了。既然学生特别关注这两句，于是我就围绕这两句随机生成了几个问题，供学生来讨论：

1.李白的自信来自于什么？既然他的政治理想是从布衣直接升到宰相，赐金放还就预示着这个理想破灭了，那他此刻为什么还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他觉得自己是一块什么样的材料？是做官的料，还是做诗人的料？一个人的理想和他所具备的才能性格之间形成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个理想才可能会实现？

2.从“古来圣贤皆寂寞”这一句中，你能否看出李白对自己长安失败的政治经历有没有过思考？有没有得出更有价值的结论？

学生经过讨论得出以下结论：李白不是一

个成熟的政治家，却是一个才华卓著的诗人、一个光耀千秋的文学家。做政治家和做文学家对一个人的能力需要和性格需要是完全不一样的。李白的自信不是政治家的自信，而是文学家的自信。经历了赐金放还这种政治上的失败，此刻的他，已经深深明白，做宰相，以他的这种傲岸不羁的性格在当时的社会肯定是不行的。

于是，学生很清晰地看到一个结论：当一个人的理想与能力错位，与性格错位时，这理想就很难实现。

做这样的总结，有什么价值呢？过去我们在讲古代的许多作家时，学生就曾提出：像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这些非常有才华的文人，他们都曾有过的很高的政治理想，但都无一例外的在政治上失败了，这到底是因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归因于封建社会？学生已经清楚地发现：他们的性格和能力与他们的政治理想之间不匹配，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有些同学将来想要从政，有的同学将来想要搞文学，到底应该培养怎样的一种性格、具备怎样的能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呢？李白的经历会不会给我们一点启示？另外，文科生里想要从政的人似乎很多，当官真的那么重要吗？没有当过官的李白、苏轼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会低于那些宰相天子吗？

泰戈尔说，教育是在传授知识，更是在传递生命意识。

这样一节看上去对考试可能“无效”的语文课，到底对学生有没有意义？如果有意义，是否能立刻体现在考试的分数字里？如果体现不出来，是不是就属于无效教学？

作为语文老师，我赞同北京教育学院季章教授的观点，教师应该有自己的专业自主权。教什么、怎么教，应该由两个方面来决定：一是我的学生的需要；二是我们自己的教学风格。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仅仅把课堂教学和考试分数挂钩这种绝对功利的思维倾向，可能会导致语文教学价值的迷失。因为语文学科学习具有滞后效应而不可能立竿见影。所以，对于语文教学来说，隐性的和长期的效果更值得关注。

学生语言能力的加强，人格理想的形成，民族文化的领会，需要很多因素共同促成，其中极为重要的是时间，时间是一个衡量效率和效果的至关重要的变量。所以，我们应该追求高效课堂，但不能让它成为我们一味追求功利“分数”的遮羞布，更不能“拉大旗作虎皮”，打着课改的名义来糊弄人。它应该是有助于消弭而不是强化语文教学中的功利目的。眼下，是时候应该让语文课堂教学回复它的本真了。

版主寄语



2016年的第一节课和2015年的没有什么区别，下了课走回办公室，经过露台时瞥一眼浮在空气中的尘霾，再漠然地钻回办公室。长安古城，冥冥沉沉，已是多日不见蓝天白云，心里自然也像蒙了灰霾，极易陷入郁郁寡欢。所幸的是，没课的时间还能喝喝咖啡，备课时遇到问题总有热心的同事翻箱倒柜地找资料帮忙解决，上课的时候会看到比老师更辛苦的学生们仍昂着头握笔待战……就像我们身处此刻的雾霾中会忘记前不久还清晰可见的苍山碧水，我们也常常囿于一时半会儿的困境，而忘记了曾经取得的成就与快乐，重回陆上，并不是难事，但踏入泥潭时，恐惧和沮丧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击垮我们的信心。某节课上因片刻的语无伦次而懊恼地想要结束自己的教育生涯，一场比赛没有赢得预想中的成绩就心灰意冷诅咒社会的不公，正如李珊珊老师提醒的那样：“切记：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要控制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控制。”虽说世间的成败有一半取决于客观现实，但既然我们不能改变现实，那么就只得把全副精力集中在另一半的主观能动性之上了——其实我更倾向于，前一半的客观现实，也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去改造的。这样讲话，有点于丹老师的调调，但我们没必要为了逃离鸡汤联盟，而一跃进入反鸡汤联盟吧？与君共勉！

教育的力量

——读《品格教育》有感

王雪纯



近期，历史课进入了所有学生都很有感触的中国近代史，起先以为学生都会以一个无比悲伤、叹惋的姿态面对这段历史，很出乎意料的，各种娱乐化思维逐渐蔓延，学生们以一种戏谑的口吻看待历史当中流的血、流的泪，我不禁思考，这样的价值观是不是我们进行历史教育的初衷。百般思考之下，我重温了马丁·贝布尔的《品格教育》，也算是一点收获吧。

在文章中，马丁·贝布尔认为教育过程中师生双方是主体间的“我——你”(I and you)关系，而不是把双方看作是某种物品的“我——它”(I and it)关系。师生间这种“我——你”是一种相互对话、包容与共享的互动关系。对师生互动中师生间关系的这种理解，克服了以往忽视学生主体地位的不足，把教师和学生都看做真正意义上的人，树立了师生尤其是学生作为主体的人在师生互动中的形象。任何教育活动都是在交往中实现的，教师与学生总是处于一定的交往与互动关系中。没有交往与互动，教育活动便不可能发生。因此，师生交往、师生互动与由此形成的师生关系本身就是教育活动中的表现形式，具有教育性。关于教育互动，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把握：第一，师生互动是存在于师生之间，在师生之间发生的一种人际互动，其互动主体是教师与学生，并且师生双方在互动中是同等重要，互为主体的。第二，师生互动是一种交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过程。师生互动不是教师对学生或者学生对教师的单向、线性的影响。同时，师生间的这种交互作用与影响又不是一次性的或间隔的，而是一个链条、循环的连续过程，师生正是在这样一个连续动态过程中不断交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

贝布尔认为，“我——你”从动态讲，就是一种精神上的相遇关系，是一种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是一种对话。“我——它”的关系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一种独自、一种经验与利用的关系。“我——你”关系中“你”不再是我的经验和利用物，也不再是为了满足我的这样或那样需要，而是一种真正彼此相互信赖的关系，是人类应该有的真正关系。只有这种关系才能揭

示出人生的真正意义。可见“我与你”关系的确立表明其出发点既不在“我”，也不在“他者”，而在“我与你”之间。而“之间”的最好体现便是对话。双方步入关系的领域，就是我与你的相遇，相遇在时间的当下，面对面的交流。在相遇中，人们摒弃唯我独尊，进入真实的关系世界之中，这种关系具有直接性、相互性和动态性。

贝布尔之所以将师生关系定义的这样明确，便是想要达成师生之间的相互对话、相互理解、相互共享、相互促进，最终达到一种共赢的状态。那如何创建这种人性化的“我——你”教育模式呢？

首先在老师层面。老师在最初的这种“我

——你”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老师相对于学生有更多的人生阅历，有更多的社会感悟。因此很有可能，也有机会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傲视自己的学生，以求使学生对他产生敬畏感，进而使得自己的地位远远高于学生。这不是“我——你”模式中的理想状态。要做到与学生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共享，相互促进，教师首先要有一颗真诚而平等的心，并不能够因为自己的见多识广便产生高傲的姿态，并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学生，甚至因为自己的所谓经得起社会检验的生活理念与方式而对学生的稚嫩、甚至是错误的观点、行为嗤之以鼻，甚至是多方打击。其次，作为教师，一定要有倾听的能力与欲望，不能永远将自己置于一个教导学生的地位。许多学生往往在将自己的想法、甚至是自己的心里话与教师分享时，教师都直接略过聆听的环节，直接给学生以指导，致使学生在“我——你”的教育模式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自主性与自发性愈发减少。接着，教师还要有参与实践的心与能力。许多教师都认为自己时间紧缺，往往将自己置于一个发号施令的位置，不参与学生的实践中，只是对学生的实践成果加以评判，这便在无形中疏远了自己与学生距离。最后，不得不指出的是要想达成

“我——你”这样的理想状态，教师必须具备的是不断学习的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所接受的知识范围越来越广，深度越来越增加。一个教师如若只是用古老陈旧，又不符合时代新旋律的知识观念来安身立命，与学生之间的隔膜定会越来越大。

接着在学生层面。首先，学生要有一个高贵的灵魂，这也是马丁·贝布尔一直所强调的。高贵的灵魂不是要学生用傲娇的心态面对世界，而是要学生将自己与别人一样看做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个体。这是敢于表现自己、敢于向世界提出质疑的最基本条件，但是，这是中国学生普遍最缺少的一点。其次，要想达到“我——你”这样充满人文主义关怀的状态，学生一定敢于要老师参与到自己的日常活动中。这并不是要老师时时刻刻约束自己的行为，更不是将自己的隐私暴露给老师看，而是将老师看做是与自己相同地位的个体，敢于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别人。接着，我想阐发的一点是“我——你”这种平等但又不乏人情味的关系并不是仅仅需要出现在学教师与学生之间，通过案情越来越令人深思的朱令案，我们完全可以希望，可以要求学生与身边同学之间也要保持这样的状态。自己与身边的同学铁定会有差距，这种差距要是被恶性利用，便会产生恶果；同样的，若是有的学生自恃优秀，不顾及他人情况，一味要求别人按照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思想去办事，将自己置于比他人高的地位，也会产生令人不敢想象的结果。最后，不得不注意的一点是学生倘若要保持“我——你”这样和谐的关系中，自己首先得以进步的姿态面对别人，面对世界。这并不是说自己在某一方面有造诣，也不是说要超越别人，而是要产生自己的价值，不能以一颗静止的、不思进取的心去面对世界，面对明天。

“我——你”这种充满人文主义关怀的教育模式并不会因为地位问题使得师生关系产生恶性变质，而是想要创造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开放的环境要老师与学生共同进步。在产生思想上的共鸣之后，学生也能够真正融入到老师营造的世界中，共同思考，共同成长。